

照亮新时代的“星星之火”〔*〕

——列宁早期党报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高金萍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列宁的党报思想经历了建党、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与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重要思想资源。列宁在《火星报》创办前后及期间撰写的经典文献与《火星报》实践,生动展现了列宁全党办报思想的萌芽与实践。列宁的早期党报思想来自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鲜明的实践光芒,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一脉相承。时至今天,列宁早期党报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业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列宁;《火星报》;党报思想;实践光芒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11.004

1919年1月5日,李大钊为《每周评论》第三期撰写的社论《新纪元》唱响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歌,这篇社论称“十月革命”“洗出一个新纪元来”。李大钊用抒情的笔调赞颂“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的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1〕}“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列宁主义,送来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程。追本溯源,是20世纪初列宁创办《火星报》,以办报实现思想建党和组织建党,以社会民主党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最终开辟了人类无产

阶级革命的“新纪元”;是列宁创办《火星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苏俄化。本文围绕旧《火星报》创办前后列宁“全党办报”思想的构想、实践及深入思考的过程,以《列宁全集》为依据,重读经典以阐释列宁早期党报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业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全党办报”之构想:《工人报》时期对党报功能及宣传策略的思考

《工人报》是俄国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秘密报纸,1885年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党”的名义在彼得堡创刊。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工人报》被指定为

作者简介:高金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项目“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数字化研究”(19MXG07)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机关报,当时该报仅出版过两期。然而,仅有6个组织共9位代表参加的党的“一大”刚刚宣布党的成立、发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还未来得及制定党纲和党章,3人中央委员会就被沙皇警察抓捕,《工人报》被捣毁,建党实质上并未实现。1899年《工人报》计划复刊并邀请列宁参与编辑部工作。为此,尚在流亡中的列宁为该报撰写了三篇文章(《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因为复刊计划并未落实,这三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其中《我们的当前任务》和《迫切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列宁对党报功能及宣传策略的思考。

《工人报》时期,俄国经济派在党内占据着优势。19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派推崇西欧的伯恩斯坦主义,^[2]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满足于分散状态,醉心于经济斗争,忽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分散和自发倾向助长了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思潮又加剧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严重损害着蓬勃发展的俄国工人运动,使党进入一个混乱、瓦解、动摇的危机时期。此时,列宁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正遭流放或在国外,社会民主党没有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

列宁在流放地关注着俄国革命和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创造性地提出,通过党的机关报广泛地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是俄国革命与法国、德国革命的重要区别,而这一区别是由俄国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列宁从克服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建立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政党出发,提出“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3]由此,列宁把办党报确定为建党之基础,把办党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当前党的活动散布于工人运动的多种方式之中,如地方性的鼓动、游行、罢工等等,只有通过全党机关报把这些活动结合起来,这些斗争方式才能发挥其真正价值,创造党的共同经验,形成党的传统

和继承性,“党的机关报不但不会同这些活动对立,反而会给这种活动的扩展、加强和系统化以极大的影响”。列宁引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的口号:“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organisieren”(学习,宣传,组织),^[4]阐释了他对党报功能的最初认识,党报就是党“学习、宣传、组织”工人运动的中心。

在《迫切的问题》一文中,列宁认为,要完成“我们的当前任务”就“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有的翻印书报,有的从国外转运书报,有的把书报分送俄国各地,有的在各城市分送,有的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筹募经费,有的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负责联络,如此等等”。^[5]这些专业化的活动具体可归纳为两类:一是收集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通讯和材料),使党的机关报与工人运动保持经常的联系、反映整个运动的情况;二是把党的机关报发行到全国各地,学习德国社会民主党“红色邮政”的做法,实现党报的国外出版、国内发行以避免专制政府的破坏。换言之,每个党员都被“编织”到党报活动中来,“编织”到推翻专制政府的伟大事业中来。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党报的重大意义在于,“只有把全党机关报创办起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行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他是那根一定要勒死俄国专制政府,即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死敌的链条上的一环”。^[6]党报工作赋予每个党员以身份意识和看齐意识。

这两篇文章是列宁最早关于党报功能和党报工作策略的论述,从党报功能角度来看,列宁敏锐地认识到党报能够通过新闻宣传对工人运动发挥组织领导作用,一方面通过梳理和总结阶级斗争经验指导工人运动,另一方面通过宣传鼓动整合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把工人运动引向深入。从党报工作策略角度来看,他把每一个党员的“专业化”党报工作视为党所领导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通过党报出版和发行工作

把每个党员团结起来、凝聚起来。这就是列宁对“全党办报”的构想。

二、“全党办报”之实践：《火星报》将 马恩办报思想与俄国实践相结合

《火星报》是俄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报纸。1899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就开始筹划创建这份全俄政治报，希望通过报纸来统一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从1900年12月24日《火星报》在德国莱比锡创刊，到1903年10月19日退出编辑部，列宁一直主持《火星报》的工作，审阅和修改国内各地工人生活状况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通讯稿件以及许多揭发性材料，编辑国际事件的通讯并撰写编者按和评论。从给《工人报》撰稿、到组织创办《火星报》，列宁行动的核心都是建党，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每时每刻体现于办报活动之中，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办报思想与俄国实践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列宁亲自撰写了《火星报》与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合作协议草案等文稿，巨细无遗。其中，1900年8月下旬在《火星报》出版前三个月撰写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一文，从微观到宏观对报纸的出版进行了细致的谋划。对于报纸的出版方式，列宁提出每期1—2个印张，不定期出版。对于编辑部成员和撰稿者，由来自“劳动解放社”成员（格·瓦·普列汉诺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一些国内外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人士组成。对于报纸的办报方针，列宁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主张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对于如何将党的机关报办成每个党员自己的报纸，列宁提出的办法是，“每个小组都来报道一切有关运动的消息，都来介绍自己的经验，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对文章的要求，作出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的评价，总之，每个小组都来谈谈它对运动的贡献和

在运动中的收获”。^[7]列宁的“全党办报”思想在《火星报》编辑工作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1900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意见分歧严重、思想混乱，读者被这些不同的主张所迷惑，工人们受困于一时的经济利益也沉湎在“经济派”的说辞中，民主革命这个中心任务被模糊，针对这种情况，列宁认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加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思想上的统一，才能为革命提供前行的强大动力。为此，必须“建立负责运动中心联络工作的组织，传递运动信息，供应定期报刊”。^[8]这是列宁结合俄国国情，从现实出发的选择，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在党内坚持批评自由，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大发展。列宁支持在党报上公开进行论战、合理表达不同观点，实质上为党内民主讨论和舆论监督敞开了大门。首先，这种论战既是不同观点的竞争，也是撰稿人之间同志式的探讨，列宁认为“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展开论战是必要和适当的”。^[9]其次，为推动党内讨论设定了框架——围绕党纲开展讨论，以推动党内广泛的思想交流并最终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在《我们党的纲领》一文中列宁指出“为了使争论不致没有结果，不致变成个人的争吵，不致造成观点混乱和敌我不分，在这场争论中绝对必须加进纲领问题。……只有在争论中加进纲领问题，只有争论双方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纲领性的看法，才能解答所有这些亟待解答的问题”。^[10]心理学中的“潘多拉效应”（又称“禁果效应”）认为，由于人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简单的禁止会让人产生怀疑、疑虑，进而反其道而行之。根据这一效应，告诉他人做什么或不许做什么，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否则可能适得其反。列宁主张党报上的公开论战，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也赋予读者以信任。他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变俄国，相信党的纲领必能击败经济派的主张。

虽然列宁对《火星报》的创办进行了高瞻远

瞩的设计,但是实施过程中始终困难重重,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阻碍着办报,甚至编辑部内部也有不同观点。列宁从流放地返回后即远赴苏黎世与“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就办报事宜进行磋商,但是二人就是否应该在报纸上展开公开论争等问题发生分歧,这一事件暴露了编辑部内部的思想分裂。列宁在《“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一文记录了他与普列汉诺夫的争执:1897年“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司徒卢威在《新语》杂志上说自己的目的是想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时,“格·瓦·(作者注:普列汉诺夫)没有起来反对,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并且永远也不能了解)撰稿人之间怎么能在一个杂志上进行论战”。^[11]对于列宁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普列汉诺夫不同意且不提出修改意见。争执进行了几天,编辑部的几位同志多次争吵,又多次商谈,最后达成了妥协:六人编辑部表决时,普列汉诺夫算两票。这虽然让“火星开始有希望重新燃烧起来了”,^[12]但是也为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火星报》编辑部的分裂留下了隐患。

三、党报三大功能的阐述:《从何着手?》

1901年春俄国工人逐步从经济罢工为主转向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工人运动进入新阶段。与此同时,农民暴动遥相呼应,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统治的运动也活跃起来。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工党仍处于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大大落后于群众的自发运动。没有党的集中领导,俄国革命的未来岌岌可危。面对建设一个真正统一、集中的政党组织的迫切需求,列宁为《火星报》第4号撰写了社论《从何着手?》,他从政治鼓动的性质与内容入手,阐述了党的组织任务和建立全俄斗争组织的问题。

列宁再次强调,“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的第一个

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得以不断向深广发展的基线”。^[13]报纸的任务,一是通过宣传鼓动,把地方的运动合成全国性运动;二是通过报纸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日常的共同性工作,即教育党员密切关注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拟定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这个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4]

从1899年列宁在为《工人报》撰写《我们的当前任务》中将党的机关报视为“组织者”,到1900年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强调《火星报》的宣传功能,再到《从何着手?》中明确提出党的机关报的三种角色——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至此列宁对党报功能的论述已经成熟,党报三大功能即:理论阐释(宣传员)、广泛传播(鼓动员)、组织领导(组织者)。

列宁在《〈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中曾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定位进行过论述:“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15]在列宁看来,“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杂志应该刊登“有关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科学、政治、党的组织问题等等方面的东西”,即宣传;党的报纸“必须把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具体事例和表现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必须从理论上阐明每一个事件,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即鼓动。“宣传员”和“鼓动员”分别从理论阐释(诉诸理性)和联系实际(感性激发)两个层面发挥作用。党报的组织领导功能体现在哪里呢?列宁认为,“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施工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有助于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火星报》的“代办员网”。列宁认为,“假如我们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办共同的报纸,那么,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

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16]可以说,列宁是把“代办员”视为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未来党的骨干和中坚。

四、列宁早期党报思想的实践光芒

在《火星报》影响下,1902年底俄国工人运动的高潮逐渐显现,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城首先开始全城罢工和示威游行,而后扩展到全俄27个城市。列宁迅速把握这一革命发展形势,领导《火星报》积极筹备党的“二大”。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党章,这标志着列宁主义的正式诞生。“二大”明确《火星报》为党的机关报,并决定由列宁、普列汉洛夫和马尔托夫三人共同主持《火星报》编辑部工作。1903年10月19日列宁退出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火星派少数派(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在《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中,列宁坦陈退出编辑部的原因是在“二大”上发生的火星派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歧,而分歧中“真正原则性的争论,是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17]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至“二大”,列宁从建设一个统一、集中的政党这个目标出发,积极筹措创办《火星报》,撰写大量理论文章阐述《火星报》的办报宗旨、探索办报策略、培养“代办员”。在办报过程中他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党报思想——全党办报、党报功能、办报策略。通览《火星报》创办前后及期间列宁的经典文献,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列宁的早期党报思想来自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鲜明的实践光芒。

其一,在不断斗争中形成和发展。列宁的早期新闻思想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从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俄国工人革命始终受到欧洲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影响,正如列宁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一文中所分析的,“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一诞生(1895—1896年),就

立刻划分成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虽然这种划分的形式、外貌等等不断变化,但其实质从1894年一直到1914年却始终不变”。^[18]从党的“一大”召开前后,列宁就深刻地认识到经济派对工人运动的误导,他与普列汉诺夫就《火星报》编辑部领导权的磋商,与火星派少数派在“二大”上就党章的斗争等,都促使他深入思考如何在沙皇俄国的严密控制下创建党报、办好党报。

其二,于实践的调适中发展和成熟。任何理论和活动都是具体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列宁早期新闻思想是在与俄国革命形势的不断适应中发展和成熟的,随着俄国革命形势的逐步变化,他不断调整关注重点,领导《火星报》从传播党的纲领,到培养“代办员”,再到组织全国党的组织协调一致进行罢工游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本土化运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

其三,创造性地运用党报的多种功能。列宁不仅重视党报的宣传功能和组织功能,而且主张在党报上进行公开论战,在论战中消弭分歧,在马克思主义下达成共识。列宁主张编辑部发挥沟通平台的功能,打破过去那种分散的“手工业方式的”工作,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主张利用报纸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促进全俄工人统一行动、反抗沙皇专制统治。党报“要联合一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把他们团结在一个党内……既要包括各种不同的观点,又要保持机关刊物编辑方面的严整性”。^[19]在这一总的宗旨下,党报成为党铸造共识的中心。

从1897年列宁被流放,到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期间列宁将制定党章、宣传党纲作为建党的核心,而《火星报》就是列宁完善和传播党的纲领和理论、争取更多革命者认同党的纲领和理论的“窗口”和“展台”。列宁重视实际行动,同时也深刻认识到纲领和理论对于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政党的重要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20]党报犹如鼓风机,必

将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照亮新纪元。

列宁生活在两个世纪的交汇点上,他的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既经历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黑暗生活,又领导俄国人民迎接了社会主义的曙光。^[21]列宁的新闻思想也经历了建党、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列宁深化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全面深刻把握列宁早期党报思想,也是我们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原则的前提和基础。

五、列宁早期党报思想对于新时代的现实价值

2020年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站在这个节点重温列宁早期党报思想,仍然能够感受到列宁燃起的“星星之火”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业的思想启发。

(一)明确马克思主义是新闻宣传的根本指导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过程中,提出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是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22]列宁吸收并践行了这一思想,他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火星报》的办报方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报道俄国社会发生的新情况,把党的理论宣传融入具体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报道和新闻评论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火星报》的读者,使之自然而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遵从社会民主工党的主张。

20世纪初期,中国人民与俄国人民同样背负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苦苦寻找救国出路之际,“十月革命”的胜利启示了他们,马克思主义给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以前进的方向。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正式成立,马克思主义从此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

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组织和领导中国革命,而且逐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结合中国实际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1925年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时就在该报发刊词中提出:“用事实说话”,这是针对革命进程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党指导思想的干扰而提出的。194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报告中提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这是针对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及民营报刊《大公报》散布的歪曲中共形象言论的有力回击,继承了马恩和列宁对新闻真实的要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苏俄化之后进行的再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党报思想的理解、接受和转化。在中国完成了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化要求再次摆在我们面前。当下,平台媒体、社交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西方新闻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博弈也转移到互联网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在哪里,我们的阵地就在哪里”,要在牢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之中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优良传统。在最近新冠肺炎疫情中,各种虚假新闻和谣言此起彼伏,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以高级黑、低级红的方式冲击主流意识形态。面对纷纷扰扰的舆论环境,党的新闻从业者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才能“乱云飞渡仍从容”,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依托党媒组织和指导革命运动、开展党的工作

列宁依托报纸进行宣传和鼓动,用党报组织和指导运动,以唤醒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为改变自身状况和获取应得利益而斗争。在列宁眼中,党的机关报犹如党手中的“指挥棒”,不仅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主张传播给大众,而且指引着大众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列宁

认为“没有革命的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中获得重要启示,以革命的报纸、革命的宣传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武器。古田会议时期,毛泽东就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23]红军宣传就是要扩大政治影响争取群众支持。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把报纸视为指导政治、经济和军事工作,组织和教育群众的武器,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要求党的干部“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24]把党媒工作置于党的中心工作之中,这一做法延续至今,切实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论述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政策文本之中。

从建党初期到拥有9000万党员成为全球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承担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要任务。^[25]新时代中国新闻业如何做好举旗定向,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当好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必须契合当下传播格局的发展,全面客观地传播信息、沟通情况,深刻阐释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围绕新闻宣传,传递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做大“中国的朋友圈”。

(三)坚持党内批评自由,力戒新闻宣传的片面性

恩格斯认为能够进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1889年12月他给丹麦社会民主党领袖格爾桑·特利尔的信中写道:“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26]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依靠党内批评进行党的自我完善的传统,在《火星报》筹办过程中,他与劳动解放社成员就是否在报纸上开展论争进行了斗争;在旧《火星报》出版时期,他与党内经

济派就俄国革命究竟应是经济革命还是政治革命进行过论争;在新《火星报》出版时期,他撰写文章与孟什维克进行过斗争。列宁身体力行呼吁社会民主工党用党内批评增强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壮大布尔什维克队伍,为革命胜利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1906年在社会民主党四大召开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更趋激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中仍然大声疾呼:“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27]列宁希望以党内批评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强调民主集中制,主张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他并不忽略少数意见。从《火星报》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始终认真听取少数反对派意见,或者将其意见转化成新的决策成果,或者与之进行公开的辩论,从未想过要消灭他们。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纠正党的缺点错误的自觉行为。1947年《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促成了党的新闻战线的自我教育,从思想上、组织上纯洁了党的新闻工作队伍;在维护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原则、防止失实新闻的同时,丰富了党的新闻理论。^[28]坚持新闻真实性、坚持党内批评,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坚持以多种形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文化政治的有机运动推动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辨析,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在新闻宣传中戒除简单化、片面化和绝对化;把公开批评与“内参”相结合;把反映公众意见与引导公众参与相结合,这是推进党内批评和舆论监督,激发新时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活跃因素的有效路径,坚持党内批评和舆论监督,不仅有利于党的建设,而且有利于中国特色新闻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光照百年,它强大的生命力在于

其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统一。1899年列宁在给《工人报》写的《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29]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开放的、创造性的态度,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学习。持续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对列宁主义的最好继承。

注释:

[1]方汉奇:《十月革命在中国报刊(1917-1921)上的反映》,《新闻业务》1957年第11期。

[2]伯恩斯坦主义,指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产生重要影响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二战后欧洲各个社会党实行多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爱德华·伯恩斯坦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治家,在国际共运史中他充当了一个背叛者和分裂者的角色。他直白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的学说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批判对象,也是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需要防范的最大敌手。

[3][4][5][6][7][8][9][10][12][15][17][19][29]《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8、169、171、173、317、316、316-317、187、310、287、186-187、288、161页。

[11]《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4页。“格·瓦·”指普列汉诺夫。列宁指的是彼·别·司徒卢威发表于1897年《新语》杂志第8期上的《再论自由和必然

性》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司徒卢威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学说。列宁在1899年6月27日(7月9日)写信给亚·尼·波特列索夫说:“我真不明白,卡缅斯基(普列汉诺夫——编者注)怎么能对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发表在‘新语’杂志上的反对恩格斯的文章置之不理!您是否能给我解释一下?”

[13]《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7页。

[14][16]《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10页。

[18]《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8-106页。

[20]《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24页。

[21]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

[22]项德生、郑保卫:《新闻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4-215页。

[23]《毛泽东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页。

[2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13页。

[25]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22/c_1123310844.htm,2020-02-14。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24页。

[27]《列宁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8页。

[28]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5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